

孙津 著

转型的中国

改革开放现有的模式已达到了一个效用临界点，其负面效用已经出现并正在蔓延。作者在指出这一现实的同时，提出了关于中国转型的建设性构想。

转型的中国

孙津著

(川)新登字 015 号

责任编辑 姜 涛

封面设计 旺忘望

转型的中国

孙津著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飞达印刷厂 印制

开本 850×1165 毫米 1/32 9.0 印张 字数:200 千字

1994 年 9 月第一版 1994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ISBN 7—5616—1902—4/2.87

印数:1000 册 定价:10.10 元

目 录

补序	3
第一章 导言	7
第二章 选择的历史	16
1. 第二种选择	17
2. 封闭的权宜	28
3. 对立的缓和	36
第三章 五四的内在矛盾	48
1. 被动的现代化参与	49
2. 接受马克思主义	60
3. 科学与民主的真实含义	73
4. 矛盾的弱化	83
第四章 强化意识形态	86
1. 民族主义	87
2. 政治结构	96
3. 界线划分	106
4. 革命与解放	115
第五章 启蒙与批判	121
1. 自由与反传统	122
2. 人权与法制	128
3. 动乱与改革开放	139
第六章 政治现代化	153
1. 保守政治与初级阶段	154
2. 执政党	162
3. 退与进	170
4. 教育与文化	177

第七章	后社会主义	184
	1. 第四种选择	184
	2. 同化政治参与	190
	3. 优化运作模式	209
	4. 强化综合国力	219
	5.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32
附 录	一、中国社会转型系列	237
	1. 经济篇	237
	2. 政治篇	240
	3. 文化篇	244
	4. 知识分子篇	248
	5. 教育篇	252
	二、市场与人权	255
	三、进入国际市场的战略构想	262



孙. 伟

博士



补 序

所以叫做“补序”，是因书稿在三年前就写成了，1992年6月又改过一遍。概况说来，本书主要谈两个问题。

第一，从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来讲，中国现在的社会转型具有后社会主义的性质。

可以说，把社会主义看成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的理论，只是诸多有关人类社会演进的学说中的一种，而把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看成一种必然规律则是不符合现实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过是时间上先后生成的两种不同社会形态的选择，事实上，它们不仅平行发展，而且它们各自的种种功能，可以比例不等地同时存在于一个国家之中。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格局来看，社会主义制度在大部分曾经实行这种制度的国家中的解体，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都表明过去曾经有过的那种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已经为现代化文明所摒弃。就中国在国体、政体以及意识形态方面对社会主义的延续和坚持来讲，它只能是一种后社会主义。中国现在称自己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其实这只在理想信仰的意义上才是符合逻辑的。然而事实是，中国自己也认为自马克思那里传出的、作为理想信仰的社会主义从未真实存在过，其理论体系本身也是需要不断调整完善的。既然如此，没有“高级阶段”或“完善阶段”的“初级阶段”一说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承认并认真弄清这种既非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有助于中国解放思想，丢掉意识形态包袱，实实在在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成功的现代化之路。

第二，中国的改革，其根本意义在于使意识形态承诺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矛盾冲突失去意义。

就这个问题本身所要达到的目的来讲，邓小平发明的“不争论”是有道理的、务实的。但是，改革开放至今，这个问题并没有弄清楚，甚至都没有明确提出过。人们做事情，的确不总是先有很清晰明确的思路的，但改革开放已15年了，一些基本思想仍不很清楚就难免误事。仅仅靠不争论，未必能够解决问题。

具体说来，这种误事已造成两个主要结果。其一是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不同步，前者往往被后者所延误。其二，改革基本上是采用了一种避难就易的做法，这样做虽然使中国保持了形式上稳定，但容易的事做得差不多的时候，没解决的问题就会积重难返，费事伤神。不幸的是中国今天面临的正是这种境况，集中体现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产权划归问题，以及与此相应的税制、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改革困难。

所谓避难就易，是指改革主要在国有经济体制之外进行，或者说，改革的经济成果明显是在政府对资源配置控制较松的地方取得的。由于非国有企业受政府制约较少，它们的发展在极大的程度上支撑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然而，这种情况所带来的消极结果在今天已日益明显。这些消极结果的最出表现，就是在主张市场经济的同时“市场”本身的真实含义仍然是不清楚的，甚至是不合法的。这一点从国有企业搞活经济的重重困难中可以明显看出来。比如，国有企业严重亏损的现象仍没有根本好转；开放价格的做法并没有增强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国有企业在税收方面的负担仍比其他所有制企业要重；国有财政收入仍未达到应有的比例；等等。所有这些，已经表明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实行并不是经济改革本身可以解决的，它在今天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体制内”的改革为什么困难重重，步履维艰？为什么政府总是和自己选择的所有制经济过不去？解释只有一个，就是把市场主体对产权的拥有看成是对与意识形态承诺相矛盾的私有观念及私有制的合理化和合法化。意识形态承诺是要维护社会公正、消灭剥

削、达到共同富裕，于是就排斥私有制。这种承诺和相应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就是过去的社会主义，其误解在于把控制性规则的选择（运作模式）当成了对可普遍化的原则（道德目的）的认可，从而造成了作为市场主体的人、包括以公司实体存在的企业法人，在权利上的不平等。

所谓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其实质是一种法律概念，指以平等的方式所获得的平等的权利之间的交易和让渡。中国历来就有商品交易，其发达形态比欧洲早得多。但中国历来没有市场的法律型制，因为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基本控制导致了市场主体可进行交易和让渡的权利的不平等。在积重难返的今天，搞活国有企业的重大问题集中在国有企业产权的划归，正是这种只有商品而没有市场所造成的结果。国有企业搞不好，根本原因在于产权的所有者和代表人之间的责任和义务既不一致也不落实，经营者既没有独立的自主权也没有相应的获益权。没有真实的市场经济，即使用股份制公司化方式来重新组构国有企业，产权问题也依然是很难搞清楚的。

因此，市场的难以建立，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困难，实际上显露出政治改革的要求。政治改革并不一定导致不稳定，其所涉及的部门和领域也不一定就是专门政治，比如今天的中国所涉及的恰恰是经济，是经济改革所必需解决的政治问题。这样，提出后社会主义的现实意义就清楚了：过去意识形态承诺的内容并没有摈弃，但是它们不仅仅是社会主义所坚持的（没有哪一种政党的政府会否认维护社会公正、消灭剥削，达到共同富裕的道德价值取向），而且在运作模式上它们必须找到能够有效落实这些承诺的办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理论上认为发展经济的手段是超越意识形态的，但实行起来并不尽然。其实，手段和目的是不可分割的，一定的目的不是什么手段都可以采用并奏效的。超越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的，无论从主观愿望还是实际效果来讲都是如此。问题的关

键在于意识形态承诺在具体操作中其自身的灵活性和范性。在私有观念合理合法的意识形态中,个体的人的选择是第一位的,发财赚钱不仅是每个人的责任,同时也是市场经济本身的道德;而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中,个体的人从属于类的人,这个类的人又是必定要在一定的道德理想的约束和改革下才能自我解放的,这是造成产权划归困难、市场经济培育困难的最深层观念因素。

补序没有篇幅写得太多,仅仅是作一个提示:中国现在以培育市场经济为中心内容的经济改革,实际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政治改革,但是这种政治改革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不同于以往的政治运动和革命,也不会是苏联和东欧那种取代式的制度更替。后社会主义就是对这种适合市场经济、促进中国现代化的新型政治的性质和特质的表述。

事实上,人们在肯定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的前提下指出并讨论仍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困难,这本身就表明了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和主观愿望。这种深化的真实含义在于迄今改革开放的模式做法正在达到其正面效益的极限,必须尽快创设更为完善和有效的改革模式,以避免并克服正在出现的改革开放的负面效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看出,现在讨论中国转型与深化改革开放的一致性,以及这种讨论对深化改革开放的积极作用。

作者注意到近两年来学术界的一些变化,但书稿所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仍未行到认真的关注。作为求意见稿,此次印制也不作修改了。“附录”中的文章是最近公开发表的,它们或许可以更简洁明了地说明书稿的基本观点。

1994年6月15日作者识于北京

第一章 导言

有个作家朋友对我说，今后中国人谁再关心政治，谁就是傻子。

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讲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活动不能当饭吃，只会造成混乱。然而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说他的话反映了一种只顾个人挣钱的保守心态。

中国历来是一个政治国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做法，从它能被提出到被贯彻实施，哪一步都离不开政治，今天我们已认识到经济发展包需建立和完善各种公平竞争机制，以及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操作规则，这难道不是政治吗？现在要求全国人民学习十四大文件把思想统一到江泽民十四大报告所提出的基本精神上来，这当然更是政治行为；离开政治，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说法又有什么真实含义呢？

广东人很会搞钱。有个广东朋友对我说：从推翻帝制开始，历次革命广东都死了太多的人，现在我们不想再流血，然而炒股票实在也有政治因素在里头。

我想，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正处在一种转型期，在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中，政治的具体含义和操作方式也正在发生变化。历史学家利奥尼德·巴特金在1988年曾说过：“……20世纪后期，政治已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消失了……政治作为现代人类活动的特定领域已不复存在。在这个领域中，所有阶段和集团的利益各不相同，相互冲突，各阶层直接进行公开较量，人们千方百计在某种程度上调和矛盾。政治一旦消失了，一切事物就都是具有了‘政治

性’。”^①

作为“特定”领域的政治，我们太熟悉了。争夺权利的“路线斗争”、强化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冷战”，等等这些都是“特定”领域的政治。而当一切事物都具有政治性时，政治的操作方式有可能是潜在的、淡化的，也有可能是显突的、激烈的。前者比如不问姓“资”性“社”，不管白猫黑猫，反正把经济搞上去就行；后者比如把特定部门和局部领域的矛盾扩大为全社会性的不满和冲突，以动乱的形式表达不切实际的政治要求。

邓小平发明的“不争论”，正是针对中国的政治转型而言的。作为“特定”领域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是专门政治部门、特别是其中的领导集团考虑的事；而既然一切事物都具有了“政治性”，那么职能部门和全国人民就只管去操作他们的本职工作、施展他们的能力才干、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于是就不争论。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不是靠争论来维持的。不争论，是不要因为空谈或混乱耽误了时间的机遇，不争论本身并不能表明道理的正确和清楚。不争论的建设行为，本身就包括思想和理论的建设，包括认识、宣传、并使大多数人接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真实含义。

就社会形态来讲，中国最大的政治就是社会主义，而“中国特色”的生成，则表明着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所进行的实际选择。然而，什么是今天的社会主义呢？它的中国特色是什么呢？这些问题并不是真的清楚了。比如，十四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在“市场经济”前面冠以“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因为我们坚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而“市场经济”原本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所以强调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过去我们为什么不提这种市场——或者说，是否现在的社会主义与过去的社会主义已不同了

^① 转引 Z·布热津斯基：《大失败》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1 页。

呢？

追问还可以有很多，但这些已足够说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有其合理的理论建构，深化化改革开放的实践才不会是盲目的。最高领导机构的各种文件，以及有关各种基本政策的论述，已经在进行着这种理论建构。但是，理论如果是建设性的，就应该提出一些可以进行实际操作的模式。或许，正是缺乏有效的理论模式，人们才或者对政治敬而远之，或者在市场经济中不无盲目地试运气。

这们讲，并不是要求人人都去从事政治。人们厌烦政治，是因为以往的政治在内容上与人们实际的生活需要相隔膜，在效果上则往往阻碍和破坏了个人的全面发展。“特定”政治的内涵在各种活动中的“政治性”的转变，是一种政治现代化的趋向，它所要求的，是在选择的意义上使政治成为社会运作的有序规则。在此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有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真实选择，它才是中国社会的有序形态。也只有这样，某种正面的价值观，才可能作为社会习惯而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没有这种价值观，任何民族都不可能高度发达的经济，甚至也难以摆脱堕落。

为此，我尝试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自觉选择，对它进行模式分析，以期理论建构和实际操作提供一些建设性的参考。

什么是作为自觉选择的社会主义呢？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状来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自觉选择，基于两个主要事实。其一，社会主义的模式多样不同，甚至得不到共识，比如象挪威、瑞典那样的社会主义，在中国、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根念中都是难以成立的。其二，符合经典的或正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国家都不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变革而成的，而且，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平行共存中，意识形态的对立越来越让位于经济制度的趋同。这两个事实表明，与其说社会主义已被证明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不如说是“更自觉”的模式选择。因为，社会

主义从一开始就有使大多数人共同富裕的承诺，这样，比起资本主义来，社会主义更具有选择的主观性和自觉性，更少有客观性和必然性——或者说，作为一种学说和理想，其自身并不证明可以有什么“客观规律”能够保证社会主义一定会出现并取得成功。

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也无论是从整个世界还是某一国家地区来看，社会主义都已成为活生生的社会现实，而不再是任何形式上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模式表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自觉选择，与社会主义是否是社会演进中的“高级”形态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同样，无论怎样看待东欧的改革和苏联的解体，都不能证明社会主义必然没有前途，或者必然“退回”到资本主义。这两方面的一致性，都只能在“自觉选择”的意义上成立，而社会主义在某一国家中的具体含义，是由那里的选择实践给出的。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从封建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变革而成的。其中，作为例外的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具有较高的工业化水平和与西欧相似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它们不过是战争结束时胜利一方的副产品或利益衍生物，也就是说它们并没有（或不完全）真实地进行过自己的选择。

这些情况表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两种不同性质和模式的社会选择。仅仅由于资本主义在形成时间上早于社会主义，这两种主义的区别或不同才有可能被误认为是低高级之分了。选择，意味着被选择者的存在是平等的、共时的、并存的，而不必定是互斥的、发展的、替代的。当意识形态的重要性由于政治目的的公开化而日渐减弱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就日益成为发展经济的不同手段了。对于世界经济制度的趋同理论尽管还有争议，但事实在已表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经济模式上可以有相通或互补之处。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不如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达的现实，使前者日渐承认

向资本主义学习的合法性。1992年中国改革再次掀起热潮时，向资本主义学习突出标识了这一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具体含义。其实，当今世界普遍的务实态度以及各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使各种发展模式具有更高的建设效率，而不是去证明哪种主义更正确、更好。

就本书的讨论来讲，并不旨在否定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而是在承认它们的区别的前提下，分析社会主义作为一种选择的真实含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的历史根据、现实内容、以及可能前途。我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看作是人类社会自封建社会以来的第四种模式选择，用国际学述界使用“后”的流行说法，也可以称之为“后社会主义”。

什么是第四种选择呢？

假如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演进的分析是大致真实的，那么，自封建社会以后，可以清楚地区分出三种社会形态的模式选择。第一种叫做资本主义，它大致可以说是从17世纪中期的英国开始的。以后的二百年间，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不尽相同，但在国体性质上大致都符合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第二种选择就是以俄国十月革命开始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以全世界各发达工业国掠夺和瓜分世界来构成其现实存在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的人们反对这种掠夺和瓜分的斗争，就被看成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然而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社会主义国家以阵营的形式出现时，它们只是在国体性质上作为和资本主义世界相区别的模式存在，既没有本国的资本主义可以“战胜”，也没有成功的向资本主义国家“输出”革命。最为关键的是，充分发展了的资本主义国家哪一个也没有因为经济危机而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第三种选择大致是在此较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各自的利弊得失之后做出的，这就是20世纪中期以后，处于半开化（或半殖民地）状态的大批农业国所自动把握的民族主义模式。这里的“民族主义”不具有规范的

定性,而只是状态描述的一个形用词,主要指它们区别于前比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民族独立和民族经济。

所有这三种选择,尽管社会变革的性质不同、斗争的激烈程度不同、社会制度的模式不同、经济发展的规模不同,但它们不仅在20世纪平行共存,而且都为着建设现代化,以自己的选择方式组成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现实格局。其中,由于社会主义标举共同富裕,并把它作为自己意识形态承诺的核心内容,因此尽管其它选择模式在实际进程中也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就主观要求来讲,却是社会主义的选择更多有改革人本身的自觉性,或者更多有要求每个人都得到全面发展的乌托邦性质。

就这些选择在本世纪的特征而言,前半世纪是以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建立为标志,后半世纪则以第三世界的现代化努力,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为标志。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因为,一方面这种比较很难找到可供对比的参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不象社会主义那样有较大社会变化这个事实,或许正表明资本主义现代化比社会主义现代化有更为定型和有效的模式。

东欧的改革和苏联的解体,很可能会生成某些新的现代化模式。就社会动荡和国家变更来讲,中国的改革开放显得稳定的多,而且中国仍然标举社会主义方向。这样,无论从社会制度的延续性还是中心价值的凝聚力来讲,中国都有可能比东欧和独联体更快的形成自己的现代化模式。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已率先在前此三种现代化选择模式之后,开始了第四讲自觉选择。在此意义上讲,改革开放的进程不仅正在具体地明确和充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真实内容,而且已经构成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一个积极的组成部分。

第四种选择的生成,并不意味着其它选择不再可能或已经失败。实际上,真正被证明是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模式,是上述第